

双重脱嵌：劳动力外流视角下贵州民族空巢老人家庭养老困境与政策响应

刘 梦

贵州大学人文学院，贵州 贵阳

收稿日期：2026年4月12日；录用日期：2026年7月22日；发布日期：2026年7月30日

摘 要

在城镇化加速与区域发展失衡的背景下，贵州民族村寨劳动力大规模外流已成常态，传统家庭养老模式面临前所未有的结构性挑战。本文基于“双重脱嵌”理论框架，揭示贵州民族村寨空巢老人面临的特殊困境：在空间脱嵌维度，代际分离导致日常照料体系瓦解、情感支持链条断裂；在制度脱嵌维度，少数民族特有的“养老文化丛”遭遇冲击，而正式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实现有效承接。研究发现，这一困境的本质是传统养老秩序已解组而现代养老秩序尚未建立的“制度间隙”问题。近年来，贵州各地探索的“邻里互助 + 片区联动”“智慧平台 + 网格探访”“社工驻点 + 志愿结对”等政策响应模式，为破解困局提供了本土化路径。本文提出，应从“替代性支持”转向“赋能型支持”，构建“家庭尽责、社区搭台、政府兜底、文化赋能”的四维治理体系，实现从碎片化干预到制度整合的范式转换。

关键词

劳动力外流，空巢老人，家庭养老

Double Disembedding: The Family Elderly Care Dilemma and Policy Responses of Ethnic Empty-Nest Elders in Guizhou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bor Outflow

Meng Liu

College of Humanities,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Received: April 12, 2026; accepted: July 22, 2026; published: July 30, 2026

文章引用：刘梦. 双重脱嵌：劳动力外流视角下贵州民族空巢老人家庭养老困境与政策响应[J]. 老龄化研究, 2026, 13(7): 540-547. DOI: 10.12677/ar.2026.137490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accelerated urbanizatio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imbalance, large-scale outflow of labor force from ethnic villages in Guizhou has become the norm, posing unprecedented structural challenges to the traditional family-based elderly care model.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double disembedding”, this paper reveals the special predicament faced by the elderly living alone in ethnic villages in Guizhou: in the dimension of spatial disembedding, the separation of generations leads to the collapse of the daily care system and the disruption of the emotional support chain; in the dimension of institutional disembedding, the unique “elderly care cultural complex” of ethnic minorities is under attack, while the formal social security system has not yet effectively taken over.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the essence of this predicament is the “institutional gap” problem where the traditional elderly care order has disintegrated but the modern one has yet to be established. In recent years, various policy response models such as “neighborhood mutual assistance + district linkage”, “smart platform + grid visits”, and “social worker presence + volunteer pairing” explored in different parts of Guizhou have provided localized paths to break the deadlock.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the focus should shift from “substitutive support” to “empowerment support”, and a four-dimensional governance system of “family responsibility, community platform, government safety net, and cultural empowerment” should be constructed to achieve a paradigm shift from fragmented intervention to institutional integration.

Keywords

Labor Outflow, Elderly Living Alone, Family-Based Elderly Care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截至 2024 年年末, 全国 60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31,031 万人, 占总人口的 22.0%; 全国 65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22,023 万人, 占总人口的 15.6%。全国 65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抚养比 22.8%。全国人均预期寿命达 79.0 岁[1]。正如都阳、崔慧敏所指出的, 农村人口老龄化正呈现“速度快、规模大、城乡倒置”的显著特征, 青壮年劳动力持续外流进一步加剧了农村家庭的养老负荷。这一宏观趋势在贵州民族村寨表现得尤为突出——毕节市仅外出务工人员即达 193 万, 约占全省总量的三分之一[2]。劳动力大规模跨区域流动, 既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的必然结果, 也深刻重塑着当地的社会结构与人伦秩序。

在贵州苗、侗、布依等少数民族传统中, “养儿防老”不仅是经济理性, 更是一套嵌入祖先崇拜、代际互惠和寨邻伦理之中的文化制度。然而, 当青壮年劳动力跨越千山万水赴沿海务工, 留守故土的父母便陷入一种特殊的“在场性缺席”: 子女名义上是赡养主体, 实际上却无法履行照料责任。这种“远距离孝道”的实践困境, 构成了理解民族地区养老危机的关键切口。

既有研究多从社会保障学、人口学视角探讨农村养老问题, 在三个维度上存在拓展空间: 其一, 将民族地区等同于一般农村, 忽视了少数民族养老文化的特殊性与韧性; 其二, 侧重于经济供养、医疗资源等“硬指标”分析, 对文化心理、情感慰藉等“软需求”关注不足; 其三, 政策研究多停留在“应然”层面, 缺乏对基层创新实践的深入挖掘与理论提炼。

本文尝试以“双重脱嵌”为分析框架，将贵州民族村寨空巢老人的养老困境置于空间脱嵌(地理距离造成的生活照料断裂)与制度脱嵌(老人脚下，祖祖辈辈踩着的“孝道”木板抽走了；头上，国家编织的“社保”安全网又还没接住他。)的双重维度下审视，并结合毕节、黔东南等地的最新政策实践，探讨一条兼顾文化敏感性与制度有效性的治理路径。

2. “双重脱嵌”视域下的民族村寨养老困境

2.1. 理论溯源

“脱嵌”概念源于波兰尼对市场与社会关系的经典论述，意指经济活动从社会关系中抽离出来的过程。本文将其引入养老研究领域，提出“双重脱嵌”分析框架：第一重为空间脱嵌，指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导致家庭成员在地理空间上分离，传统“同居共爨”的养老模式失去物理基础；第二重为制度脱嵌，指转型期社会旧的养老规范逐渐失效而新的制度安排尚未到位，老年人陷入“两头不着地”的保障缝隙。

这一框架的优势在于：它超越了“问题-对策”的单线思维，将微观的家庭照料危机与宏观的结构变迁勾连起来；同时，它强调少数民族养老困境的特殊性——不仅是城乡二元结构的产物，更是民族文化传承断裂的表征。

2.2. 贵州民族村寨的典型性

贵州民族村寨兼具三重属性：地理上的边缘性，比如群山阻隔、交通不便；经济上的滞后性，如产业薄弱、就业机会稀缺；文化上的独特性，养老会嵌入节庆仪式、寨老权威、亲属网络之中。三者的叠加使养老问题呈现出“复合型脆弱”特征——既面临一般农村的共性问题，又承受着文化断裂的独特阵痛。

以黔东南苗族村寨为例，传统社会中赡养老人不仅是家庭义务，更通过“吃牯脏”“苗年”等仪式活动获得村寨舆论的监督与认可。子女不孝被视为对祖先的冒犯，将遭到全寨的道德谴责。这种“文化规训”机制曾有效维系了家庭养老秩序。然而，当年轻人常年在浙江、广东的工厂车间劳作，他们不仅在地理上远离了村寨，更在文化认同上发生了微妙偏移——城市务工经历重塑了其价值观念，“养儿防老”的传统信条在市场经济逻辑的冲刷下日渐松动。

3. 空间脱嵌：代际分离与日常照料体系的瓦解

3.1. “远距离孝道”的现实困境

对于外出务工者而言，履行孝道面临“三重门”的考验：时间门槛——工厂流水线、建筑工地的劳动纪律严苛，请假回乡照料父母意味着工资损失与岗位风险；空间门槛——贵州山区与沿海城市动辄上千公里的距离，使“常回家看看”成为奢侈品；经济门槛——务工收入虽高于务农，但子女教育、城市房租等开支使可用于赡养的资金捉襟见肘。

代际分离对家庭照料功能的侵蚀，已得到大样本数据的佐证。陈华帅、马伟、白晨(2025)基于 CLHLS 五期追踪数据的分析发现，当老人患病时长增加或病情加重时，子女的孝顺行为呈显著弱化趋势，其背后的机制正是照料机会成本的持续攀升[3]。这一发现为理解贵州民族村寨的养老困境提供了宏观注脚：对于远赴沿海务工的青壮年而言，请假回乡照料父母不仅意味着数百公里的往返奔波，更意味着工资损失与岗位风险——孝道伦理正在经受经济理性的严酷挤压。

3.2. 日常生活照料的高度“外包化”

空间脱嵌的直接后果是，民族村寨空巢老人的日常生活照料呈现出事实上的“外包”状态——由子女承担的传统照料责任，被迫转移给邻居、亲戚或村组干部。但这种“外包”是脆弱的、非制度化的：

邻居的帮助出于道义而非义务，缺乏持续性与稳定性；亲戚的照料往往止于“有事搭把手”，难以覆盖失能老人的长期照护需求。

研究表明，贵州农村独居老年人在生活照料领域面临“三无”处境：子女安家或务工距离较远，无法经常回家探望；附近亲戚邻里多为老人儿童，照料能力有限；专业化的居家养老服务尚未延伸至边远村寨[4]。当老人患病或遭遇意外，从“发现异常”到“施以援手”之间存在危险的时间差——这种“响应真空”在交通不便的山区被进一步放大。

3.3. 精神慰藉的“双重缺席”

比生活照料更隐蔽的危机来自精神层面。民族村寨空巢老人的情感需求面临“双重缺席”：家庭在场的缺席——子女虽通过电话、视频偶尔联系，但“隔屏相见”无法替代面对面的亲情互动，老人的孤独感并未因技术进步而消解；社区在场的缺席——传统村寨中，节庆仪式、寨邻串门构成老年人精神生活的重要支撑，但随着青壮年集体离场，村寨公共生活日渐凋敝，传统的邻里互助网络逐渐松散，村寨内部的人际关系日益疏离。

黔东南州在养老服务实践中敏锐地捕捉到这一问题，探索“民族语 + 普通话”双轨慰藉模式，鼓励懂苗语、侗语的社工和护理员上门服务，用乡音乡情化解老人的文化隔阂与情感孤独[5]。这一做法从侧面印证：精神慰藉的缺失不仅是“陪伴不足”的问题，更是文化语境断裂的问题。

4. 制度脱嵌：养老文化丛的冲击与社会保障的缝隙

4.1. 少数民族“养老文化丛”及其功能衰减

少数民族传统养老模式之所以能够长期有效运转，在于它嵌入一套笔者称之为“养老文化丛”的复合制度之中。这套文化丛由四个相互支撑的子系统构成：祖先崇拜提供终极价值依据(孝敬父母是对祖先的敬重)，代际互惠提供经济理性基础(父母养育子女、子女赡养父母构成跨期交换)，寨老权威提供纠纷仲裁机制(家庭赡养矛盾由寨老调解)，节庆仪式提供情感凝聚场景(苗年、鼓藏节等强化亲属纽带)。

劳动力外流对这一文化丛的冲击是系统性的，但并非单向度的“衰退”与“断裂”，而是呈现出复杂的调适、替代与韧性。务工经历使年轻一代的价值观念向个体主义偏移，祖先崇拜的神圣性祛魅，但代际互惠的伦理并未完全瓦解，其形式发生了从“共居供养”向“经济汇款 + 情感补偿”的转变。汇款本身被赋予了新的孝道象征意义，成为远距离履行孝道的重要方式。代际居住分离使“反馈模式”的即时互惠难以维系，然而，许多在外务工的子女通过为父母购置智能手机、安装监控、支付医疗网络问诊费等方式，进行着“数字化尽孝”的尝试。寨老因青壮年缺席而权威旁落，对赡养纠纷的调解能力下降，但在一些村寨，村支两委、驻村工作队与老年协会正部分接替了寨老的功能，形成了传统权威与现代基层治理的混合仲裁模式。节庆仪式因参与人数减少而趋于简化，失去了凝聚亲族情感的功能，但在春节期间，返乡青年又会高密度地参与和资助“跳花坡”“芦笙节”等活动，使传统仪式呈现出“周期性复兴”而非全然消亡的图景。四重机制的连锁变迁，使传统养老秩序陷入一种充满张力的“旧已破、新未立”的动态真空地带，而非静态的“真空”。

4.2. 正式制度的可及性困境

当非正式制度式微，正式制度理应承接养老保障功能。然而，贵州民族村寨的现实是：社会保障体系存在显著的可及性鸿沟。

养老金水平偏低是最直观的表征。调研显示，贵州农村独居老年人的养老金领取金额多在 100~300 元之间，与日益攀升的医疗、生活开支形成巨大落差[4]。“养老金买盐都不够”虽是夸张之语，却折射

出制度保障的事实薄弱。

医养服务可及性不足是更深层的症结。山区地理阻隔使医疗资源高度集中于县城，村卫生室设备简陋、村医能力有限，难以满足慢性病管理、康复护理等老龄健康需求。黔东南州 2025 年启动的“家庭养老床位建设”项目，通过适老化改造和智能监测设备入户，试图将专业照护延伸至老人床边，全州累计建成家庭养老床位 1937 张[5]。这一数字固然可观，但相较于庞大的需求基数，覆盖率仍显有限。

办事服务触达障碍是常被忽视的制度缝隙。留守老人普遍文化程度不高，对社保认证、慢病证办理等政务流程“找不着门、看不懂表、办不成事”。威宁自治县推行的政务服务“赶乡场”，利用乡镇赶集日将服务窗口前移到老人身边，医保人员现场为慢性病老人办理医疗证，正是对这一痛点的精准回应[6]。

4.3. 双重脱嵌的叠加效应

空间脱嵌与制度脱嵌并非孤立运行，而是相互强化的：代际分离削弱了家庭照料能力，本应由社会保障及时补位，但制度的可及性鸿沟使这种“补位”难以实现；家庭养老功能弱化加剧了老年人对正式制度的依赖，而制度供给不足反过来放大了空间脱嵌的负面后果。二者的叠加效应，使民族村寨空巢老人陷入“家庭靠不住、制度够不着”的双重困境。

5. 政策响应：贵州基层养老治理的创新实践

面对双重脱嵌的结构性困局，贵州各地近年来展开了一系列具有地方特色的政策实验。这些探索的共同特征是：正视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的现实，但不放弃家庭的基础作用；承认正式制度的兜底责任，但强调社区互助的协同价值；回应普遍性需求，同时保持对民族文化差异性的敏感。

5.1. 互助养老：激活村寨内生组织资源

贵州省民政厅 2026 年印发的《农村互助养老服务发展试点工作方案》，系统布局了七项重点任务，涵盖助餐、助医、助行、精神慰藉等领域[7]。其核心理念是：在政府财力有限、专业服务难以全覆盖的约束下，激活村寨内部的人力资源与社会资本，构建“以老助老、邻里互助”的服务网络。

毕节的实践走在前列。当地探索组建“嬢嬢帮”“家家帮”等群众自治组织 2480 个，依托乡缘、族缘、邻缘编织守望相助的照护网络[6]。织金县马场镇创新的“150 机制”尤为值得关注：外出务工人员出资不超过 150 元[6]，由村内互助组织提供红白事帮办服务，既化解了务工者为红白事“两头跑”的窘境，也为留守老人提供了仪式性陪伴。这一制度设计的精妙之处在于：它以小额资金撬动社区互助，既未过度增加务工者负担，又维系了传统仪式的社会功能。但是，这些措施面临三重困境：一是纯靠热情难以持久，存在“时间银行”的兑现疑虑；二是资金与服务过程缺乏权责规范，易引发纠纷；三是“熟人圈子”可能排斥边缘老人，且难以覆盖失能照护等复杂刚需。

5.2. 智慧赋能：弥合空间的数字桥梁

针对山区地理阻隔、服务响应迟缓的痛点，贵州探索将数字技术嵌入养老服务链条。黔东南州建设州级智慧养老服务平台，为失能老人家庭配备智能床垫、紧急呼叫器、烟雾报警器等设备，24 小时监测生命体征，异常情况即时推送至平台与家属。毕节则推行“诊疗流动化 + 管理网格化”模式，村医定期上门巡诊，网格员动态走访，织密独居老人的安全防护网[6]。

技术手段的引入，实质是在“空间脱嵌”的既定事实下寻求“数字在场”的可能。但在实际推广中，往往出现“建得起、用不好”的尴尬。项目实施方常强调装了多少设备，但对老人的数字素养鸿沟关注不足。调研发现，部分老人因不会充电、误触按键导致设备停摆，或因听不懂普通话语音提示而产生焦

虑，智能设备反成“烫手山芋”。这提醒我们，技术应用必须充分考虑老年用户，特别是少数民族老年用户的认知特点和使用习惯，避免“技术中心主义”。

5.3. 文化敏感：养老服务的地方适配

民族地区的养老服务不能简单移植城市经验，必须回应少数民族老人的文化心理与生活习惯。黔东南州的“民族语 + 普通话”双轨服务提供了范例——懂民族语言的本地护理员上门，不仅解决了沟通障碍，更以乡音乡情舒缓老人的精神孤寂[5]。毕节赫章县平山镇中寨村的做法则体现了对“面子伦理”的尊重：村集体购置桌椅灶具，制定经济实惠的宴席菜谱，以“选用指定菜谱即可免费借用器具”的方式引导节俭办席，既遏制攀比之风，又避免强制干预引发的抵触[6]。

这些细节表明：有效的养老政策需要对地方性知识保持敏感，在制度刚性与文化柔性之间寻找平衡点。政策鼓励尊重民族文化，但尊重边界在哪里，目前仍缺乏清晰的指引。

5.4. 现状检视：从碎片化到制度整合的距离

肯定基层创新的同时，也需冷静审视其局限性。当前贵州民族村寨的养老政策响应仍呈现“点状突破、面上滞后”的特征：试点地区的成功经验尚未形成可大范围复制的制度方案；各部门分别推进的助餐、助医、适老化改造等项目缺乏系统整合，容易陷入“各管一段”的碎片化困局；资金保障依赖财政投入与公益慈善，可持续运营机制尚不成熟。

更深层的挑战在于：互助养老、智慧赋能等模式虽能缓解燃眉之急，却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双重脱嵌”的结构性矛盾。家庭养老功能的修复、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民族文化的传承创新——这些深层议题需要更长时间跨度的制度建构。

6. 路径重构：从“替代性支持”到“赋能型支持”

政策理念的转变，首先需要认识论的更新。徐亚东、林进龙、张应良提出的“农村生产性老龄化”概念富有启发意义：农村老年人并非纯粹的福利负担，而是持续为家庭、社区做出贡献的生产性主体[8]。然而，健康水平下降、生产资料缺失、社会身份歧视等因素，制约着这一生产性潜能的释放。对于贵州民族村寨而言，“赋能型支持”的核心正在于——不是用外部资源替代家庭与老人的主体作用，而是通过制度建设帮助老人与家庭恢复、强化其自身的养老能力。

6.1. 家庭尽责：从伦理倡导到能力建设

强化家庭赡养责任，不能止于道德宣教，必须转化为可操作的制度安排。

一是建立“孝道工资”与弹性探亲制度。可探索对与父母同住或就近居住的务工人员，给予一定的个税减免或务工补贴。针对“探亲假”在中小企业和灵活就业群体中难以落实的现实，建议将其与公共服务捆绑，例如，对定期返乡探亲且无交通违法行为的务工者，提供长途客运票价折扣。这种“道德激励 + 经济杠杆”的策略，比单一的企业责任更具操作性。二是重塑村规民约的现代治理功能。将赡养义务履行情况纳入村规民约，与集体经济分红、宅基地权益、评选“五好家庭”等适度挂钩，重建村寨舆论对孝道的监督与激励双轨机制。三是实施“归巢赋能”计划。通过技能培训、创业贷款、小微电商扶持等举措，为有意愿返乡的青年创造“家门口就业”的条件，从根源上缓解代际分离。这不仅是空间回归，更是家庭功能的修复。

6.2. 社区搭台：从道义帮扶到制度运行

将邻里互助从自发的道德行为升级为制度化的服务供给，关键在三个环节：组织化——以村民小组、

自然寨为单位组建互助服务队，明确服务内容、频次与标准；可持续——建立“服务积分”“时间银行”等激励机制，使互助行为获得符号性或实质性回报；专业化——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引入社工机构，对互助队员进行基础照护技能培训，提升服务质量。

贵州省互助养老试点已在这些方向上迈出步伐，下一步需要解决的是标准化、评估机制与长效资金保障等制度配套问题。

6.3. 政府兜底：从碎片供给到系统保障

政府应聚焦三个重点，构建系统化保障网络。

一是提升基础养老金标准的联动机制。改变普惠性调整模式，建立与物价指数、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增长率挂钩的基础养老金动态调整机制，明确省级与县级财政的分担比例，逐步缩小城乡差距，使其真正具备“兜底”功能。二是推进医养资源下沉的“柔性流动”模式。以县域医共体建设为契机，强制要求县级医院医生晋升职称前，须有在村卫生室或乡镇养老服务中心累计不少于半年的服务经历。同时，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费纳入医保报销范围，提高慢病管理、康复护理等服务的可及性。三是打造县域养老服务整合调度枢纽。建立县级养老服务调度中心，统合民政、卫健、人社等部门资源。可借鉴黔东南州“智慧养老服务平台”的做法，将其升级为集需求发现、资源匹配、服务派单、过程监管、资金结算于一体的综合平台，实现“一个口子对接需求、一套机制匹配服务”[5]。

6.4. 文化赋能：从传统断崖到创新转化

民族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养老治理并非相互独立的议题。韦海鸣、朱笑宇(2025)在边疆民族地区老龄化研究中提出，应将“文化传承保障”纳入复合治理体系，使老年群体成为民族文化活态传承的主体[9]。具体而言：鼓励村寨恢复具有凝聚功能的民俗活动，为留守老人重建社会参与的场景；将寨老、族老吸纳为互助养老的协调者，发挥其威望与调解能力；支持民族语言、山歌等文化形式进入精神慰藉服务，让养老不仅是“身体的照护”更是“文化的安顿”。

7. 结语

贵州民族村寨空巢老人的养老困境，折射的是转型期中国一个普遍而棘手的命题：当传统养老秩序在市场化的浪潮中逐渐解组，正式制度如何承接起守护生命尊严的使命？劳动力外流造成的“空间脱嵌”与文化变迁导致的“制度脱嵌”相互交织，使这一问题在民族地区呈现出特殊的复杂性。

毕节的“四事”治理、黔东南的“双轨”服务、省级层面的互助养老试点——这些来自基层的探索表明：走出困局的钥匙不在于“家庭”与“制度”的二元对立，而在于两者的创造性融合。理想的政策不是用冰冷的制度取代温情的家庭，而是通过制度创新帮助家庭在新时代重新获得照料亲人的能力，让社区在熟人社会的土壤中生长出新型互助网络，让民族文化在创造性转化中成为滋养老年生活的精神家园。

从更宏观的视野审视，民族村寨养老治理的终极目标是实现一种“有根的养老”——它不割断老人与土地、村寨、文化的血脉联系，而是以制度的力量守护这种联系，使每一个留守故土的老人，都能在熟悉的乡音、熟悉的山水、熟悉的邻里中，有尊严地走完生命最后的旅程。

参考文献

- [1] 2024 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EB/OL]. <https://www.mca.gov.cn/n152/n165/c1662004999980006089/part/21508.pdf>, 2026-04-29.
- [2] 都阳, 崔慧敏. 农村人口老龄化: 趋势、挑战与应对策略[J]. 中国农村观察, 2025(4): 3-17.

-
- [3] 陈华帅, 马伟, 白晨. 老龄化时代“久病床前无孝子”现象变迁——来自 2005-2021 年 CLHLS 的经验证据[J]. 中国人口科学, 2025, 39(6): 109-126.
- [4] 李飞. 农村独居老年人社会支持研究——以贵州省 L 村为例[J]. 村委主任, 2024(4): 167-169.
- [5] 黔东南州融媒体中心. 居家养老“小切口”托起苗乡侗寨“大民生”——我州积极探索特色居家社区养老新路径[EB/OL]. https://www.qdn.gov.cn/xwzx_5871605/bmdt_5871609/202511/t20251121_88968379.html, 2025-11-21.
- [6] 人民网贵州频道, 李中迪, 谢朝政. 把家里事儿交给我! 毕节市让百万外出工作乡亲安心闯四方[EB/OL]. <http://gz.people.com.cn/BIG5/n2/2025/1226/c361324-41455791.html>, 2025-12-26.
- [7] 贵州开展农村互助养老服务发展试点[EB/OL]. <https://www.mca.gov.cn/n152/n166/c1662004999980009801/content.html>, 2026-03-16.
- [8] 徐亚东, 林进龙, 张应良. 农村生产性老龄化: 理论阐释、现实约束与优化路径[J]. 中国农村经济, 2025(7): 63-82.
- [9] 韦海鸣, 朱笑宇. 边疆民族地区乡村人口老龄化: 现状、影响和对策——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为例[J]. 南宁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 46(4): 26-38.